

官道

赵力平 / 著

这是一本有关官场万象的书，里面涉及干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选拔使用、监督考核、人际关系、廉政建设、退休生活等诸多方面，基本囊括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作者力求用评论给后人刻画出世纪之交官场上众多的典型人物面貌，希望50年后，仍然有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大变革时期的官场。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宦道

赵力平 / 著

这是一本有关官场万象的书，里面涉及干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选拔使用、监督考核、人际关系、廉政建设、退休生活等诸多方面，基本囊括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作者力求用评论给后人刻画出世纪之交官场上众多的典型人物面貌，希望50年后，仍然有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大变革时期的官场。



和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这是一本有关官场万象的书，里面涉及干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选拔使用、监督考核、人际关系、廉政建设、退休生活等诸多方面，基本囊括了官场的方方面面。作者力求用评论给后人刻画出世纪之交官场上众多的典型人物面貌，希望50年后，仍然有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大变革时期的官场。

责任编辑：夏 青

责任校对：韩秀天

封面设计：张 冀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道 / 赵力平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30-1041-2

I. ①官… II. ①赵… III. ①政治-谋略-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D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8180 号

官 道

Guan Dao

赵力平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025

责编邮箱：xiaqing@cnipr.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6.5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62千字

定 价：38.00元

ISBN 978-7-5130-1041-2/D·1394(391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当官、干事、留名.....1	领导干部的脸面.....74
“从道不从上”.....4	文化不是味精.....77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7	“不务正业”.....81
×××文集.....10	文风的悖论.....84
领导干部要讲气节.....13	健康的思想基于健康的身体.....88
贵在有志.....16	“自杀有罪”.....91
欲望不能过度.....19	“一花独放”.....94
领袖之道.....22	“阳光普照”.....97
身教重于言教.....25	“鸡头不如牛尾”.....101
人间有味是清欢.....29	考试厅长.....104
重在“官德”.....32	德才标准数字化.....107
领导干部的尊严.....36	带“病”提拔.....111
“水清无鱼”.....39	“承诺”谁来检查.....114
“知耻而前忍”.....42	“交流是为了保护”.....117
仕而优则学.....45	树挪死 人挪活.....120
待民以诚.....48	“代人受过”.....123
要听得见真话.....51	“做功”与“唱功”.....127
报喜不报忧.....55	干部好坏谁说了算.....130
赞“无感不发”.....60	精英摇篮.....135
“锦上添花”.....64	“无知少女”.....138
“救火队长”.....68	“白骨精”.....141
“防火防盗防记者”.....71	领导来了，规格就有了.....145

官多兵少	148	房子再大也不腐败	209
纪检组长如何干	152	“有钱能使官推磨”	212
“二领导”	155	双面纪委书记	215
“组织是可信赖的”	159	官托	218
“圈论”	163	新“蛰蛰”传	221
“绝对服从”的代价	167	书记就爱喝XO	225
“俗拍”、“雅拍”	171	“红楼”	228
谁上头条	175	从严治家	231
“工业书记”	179	“取之有道”	234
自扫门前雪	183	给后人留什么	237
宁教机遇负我 休教我负机遇	186	“一家两制”	241
新官上任“三把火”	189	广交友 慎交友 交好友	244
新官不理旧账	192	政治顺口溜	247
认真者吃亏	195	发挥余热	251
“摆平就是水平”	198	提早退养是最大的浪费	253
“老鼠进风箱”	201	“人走茶倒”	256
为什么“越反越腐”	205	后 记	259



当官、干事、留名

当官、干事、留名，是领导干部非常值得重视的三件事情，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思想觉悟高低、党性强弱、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

中国历史上就有“三不朽”之说。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春秋时期鲁国人叔孙豹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立德”原指树立圣人之德性；“立功”指为民除难，救济众生；“立言”其义有二，一指著书立说——“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二指写文章——“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因此，根植于“立德，立功，立言”基础之上的“不朽”，应该就是一个人的言论、行为与德性对他人乃至社会文明产生的积极影响。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心系人民、扎实工作、甘于奉献、多干实事，在民众心中留下不朽的丰碑，以赢得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留下好名。

有这么一位领导干部 A，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理论权威。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与领导干部探讨理论的文章，被错划为“右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遭受没完没了的批斗。但他对党的赤子之心未改。改革开放后，他重新回到省级机关工作，并担任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主管一个省的理论工作。在任上，他认真敬业，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多年来，他坚持给党政机关、学校、部队和企业进行理论宣传，讲座、辅导数百场次，为成千上万干部群众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杰出贡献；他

满怀爱心，甘为人梯，为培养理论人才竭尽全力，推荐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路人；他身患绝症，仍发奋工作，先后主编20多本政治理论书籍、出版6本理论著作，有洋洋洒洒400多万字、400多篇理论文章在《人民日报》、《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发表；他身居高位，他女儿报考自己分管的下属单位，虽然他跟该单位的主要领导私交不错，但他也没有开腔、打招呼；他是党的领导干部，又是理论工作者，写了大量文章，但他从不揩公家的油，他写了这么多研究马列主义的文章，从不上省委大院打印，而是到小店自掏腰包打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A 的经历，很好地阐述了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好当官、干事、留名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立场上，他笃信马列主义、老而弥坚，个人经受巨大冤屈，从不对党有丝毫的抱怨，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在干事上，他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成果迭出，是理论工作者的楷模；在品行上，他信仰坚定、言行一致、甘于奉献、清正廉洁、无私奉献，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他实现了做人、做学问、做官的完美统一。

在世风浮躁的今天，A 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这份纯洁，这份高贵，这份无私和清廉。在他身上凝聚了太多我国传统的美德，勤勉、奋发、克己、助人、无私、善良、宽容，他的理想与信念像钢铁一样坚强，他的心胸与情怀像大海一样宽阔，他的人格与操守像星空一样高洁，他的人生与心灵像玻璃一样纯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像 A 这样的领导干部太少了，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能很好地处理三者关系，甚至发生了严重的错位。

有的人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他们看重的是权力、地位和待遇，这些人一旦权力在手，就热衷于吃喝玩乐，而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做事是为了当官，这些人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把干事看成是升官的阶梯，或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有的当官不仅不做事，还干坏事。这些人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不捞白不捞”的信条，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这些人的行为，败坏了领导干部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极为不满。

有的人只想留名，不想干事。这些人工作上无所用心，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却十分看重名气的社会作用，置留名于干事之上。为了留名，不择手段，急功近

利。他们平时不是深入基层多干实事，而是请一批秀才在宾馆里编造所谓的经验材料；请一班记者在荧屏上、报刊中吹嘘所谓的工作实绩。有的人干小事想留大名，他们采用虚报浮夸，造假数字、假指标，欺上瞒下，搞添油加醋、经验升华。

上述人与 A 相较，差异实在是在天壤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关键原因在于少数人没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没有搞清楚“领导干部的权力是谁给的，有了权力应该干什么”这一根本的问题，颠倒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认识权力，是当好领导干部的基础。我们的权力来自人民，手中有了权，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古人说：“居官不爱子民，如衣冠盗。”意思是做官不爱百姓，就像一个穿着官服的强盗。作为人民的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想着老百姓，时刻关心群众的温暖，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力求实现对党和对人民负责的统一。

必须有强烈的事业观。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兢兢业业、发奋图强，立志于干大事，而不是当大官，做到在职一任，造福一方。要刻苦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掌握过硬本领，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改革开放和开拓创新意识，善于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转变作风，扎实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挑担子，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多干实事、好事。

必须树立正确的荣誉观。“公论自在人间”。荣誉不是靠个人树立的，而是靠人民群众来留传的。领导干部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群众办事，人民群众自然会记住他；如果荣誉是通过弄虚作假而建立起来的，那么荣誉就像是瓶中的鲜花，很快就会凋谢。

必须树立正确的用人观。用人是一种重要的导向，它对促进干部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大胆起用那些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要善于识别那些夸夸其谈、追名逐利，只想当官、不想干事的人；要严肃查处那些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坑害群众的人，严格党的纪律，促进领导干部形成开拓律己、注重实绩的正确思想意识。



“从道不从上”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种“从道不从上”的政治品格。

“从道不从上”，是从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从道不从君”借用而来的。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方向、真理、事物发展的规律。“从道不从上”，就是说在工作中要坚持原则，服从真理，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盲目地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每一项指示，满足于照抄照转。

有这么一个干部 A，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在“左”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兴起了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但是这一运动并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相当一部分农民出现了怕“归公”的思想顾虑。面对这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争论，邓子恢等部分领导同志主张收缩。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而且对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推动下，全国出现了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A 当时是一个县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他通过深入调研后发现，农民对合作社的高潮存在很大疑虑，入社后，他们不是积极地去沤肥积肥，而是大批出卖牲畜；有了钱不买生产资料，而是用于抢购不急需的用品，甚至用于修坟、买棺材等。A 仔细分析了这些问题，认为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所致，是“鞋子”太大，“脚”太小。同时他还发现，合作社还存在管理不善、责任不一、效率不高、窝工浪费等诸多问题。他通过认真地琢磨和研究，在全国首个提出了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想法，并在自己所在的县付诸实施。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也知道自己行动的后果，但他坚持认为，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结果可想而知，A 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被打成了“右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但他却“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职务可以被撤，人身自由可以失去，但真理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中国农村在付出二十多年的沉重代价后，终于走上了包产到户的新路子。而 A 也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从道不从上”的价值观没有丝毫改变，在他以后的工作中，他仍然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如果上级党委政府发布一些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件，他会找主要领导干部进行谈心，反映自己与百姓的想法，促进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更大程度上贴近实际，接近真理。

“从道不从上”，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价值观，也是一个中华民族为官者应当背负的道德观：上——能够为民请命，下——能够治国安邦。

“从道不从上”，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想问题、做事情、干事业，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道”而行，才能取得成功。反之，脱离实际、违背规律、唯上是从，只能事与愿违、贻害无穷。我们党历来重视探索，善于创造，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毛泽东、邓小平等就是“从道不从上”的典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从道不从上”的产物。陈云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是对“从道不从上”的最好解释。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却是“从上不从道”，他们不认真领会中央精神或上级指示，也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对上级的指示照搬照转、生搬硬套，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满足于当“收发室”、“传声筒”。个别人为了追逐名利，迎合、讨好上级，思想庸俗化，办事看脸色，甚至放弃原则，欺上瞒下，阿谀奉承，抬轿子，吹喇叭。这些“从上不从道”的种种表现，必然导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落实，造成人民群众的利益无法实现。应该看到，近年来，上述现象在党内有越演越盛的趋势。

当前，改革和建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要把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这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要做到“从道不从上”，全面、积极、正确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勇

于实践，大胆探索，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从道”，最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并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据客观情况、从全国的大局出发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执行，来不得半点马虎，绝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囫囵吞枣，照抄照转，而不需要分析，不需要“结合”。实际上，只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加以认真领会，然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这才是真正的“从道”。实践证明，只有那些理论思维能力强、视野开阔的干部，才能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作出正确的判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那些缺乏理论思维的人，在实践上不是照搬照抄，就是简单化、一刀切。

“从道不从上”，必须具有“持道”的勇气。在现实工作中，不求甚解，照抄照搬，当“收发室”、“传声筒”，搞一刀切，是最简单、最容易，也是最“保险”的。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吃力又有风险，会因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遭到反对和嘲笑，甚至受处分、丢乌纱帽。因此，“从道不从上”绝非易事，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有高尚的情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进步的，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这才符合共产党人的本色，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在机关里，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这句话，上下之间，认识很不相同，褒贬不一。如果上对下，就是贬义的。因为在这个时候，这句话就变成了做下属的不能做好本职工作，对于上面决定的政策，不仅没有很好地落实，反而阳奉阴违，做违背上级政策规定的事情。如果将此行为“上纲上线”，轻者是目无组织，目无领导，重者是违纪。但如果是下对上，就是褒义的。因为当上司提出的要求和任务不切本地实际时，下属不僵硬，不死搬硬套，而是从实际出发，办实事，对上采取一种圆滑的方法来应付，做符合群众要求的事，也就是说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创新。

同样一句话，结果会如此不同，作为一个从政者，应该如何认识、如何把握呢？

20世纪90年代，某县县委书记 A，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能干的领导者。在政治纪律上，特别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党的团结等方面，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思想作风上，特别是在廉政建设、思想道德修养等方面，他率先垂范，为人清廉，从不上歌厅、舞厅，也不受人礼物，发挥了县委书记的表率作用。应该说这些方面，他都很好地体现了党的基层领导的表率作用。

但在经济建设上，A 又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当时，全国推行城市化，全国都是大工地，都是开发区、大学城，投资规模极度扩张，大家都要用钢材、水泥，原材料、能源、电力供应非常紧张。中央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泡沫，采取了宏观政策调控，力图将过热的经济压缩下来。为了保证宏观调控到位，中央采取经济、

法律、行政、纪律等方法，各种手段一起上。在中央严格的政策调控下，全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货币紧缩，经济下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等现象。A 所处的县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当时所受的经济冲击，与全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唉声叹气、感到无可奈何之际，而 A 却领导全县开展解放思想运动。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辩证法，强调要“遇到绿灯抢道走，遇到黄灯加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在他的坚持下，全县干部挺起腰板，顶风而行，结果在其他各地经济普遍萎缩之际，A 县经济却逆势上扬，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过了若干年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A 县经济更是如鱼得水，一下子就将周围若干地区的经济远远抛在了后面。A 也一下子成为发展经济的典型，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上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也得到百姓的高度赞扬，他的一些经济观点在百姓中得到颂扬。

A 的做法对从政者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认识。必须明确，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大改革、大变化时期，一切都处在探索尝试阶段，在社会发展多变时期，上级党委政府对一些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把握得非常正确，因而导致一些政策的制订缺乏科学性、完整性和连续性，这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中国区域如此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此不平衡，即使上级党委政府制定的政策从全局来看是正确的，但从某个区域来看，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因此，无条件地强调下级服从上级，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要求。作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必须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上级的政策，而决不能依葫芦画瓢，“拿、搬、抄”，政策上规定的就做，政策没有规定的就不做或者不会做，这样的干部不是人民喜欢的干部。

其次，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的“对策”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把握。上级党委政府决定的许多政策是不能变通的。比如政治政策、干部政策、廉洁政策、宗教政策、安全政策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都是不能变通的。我们所说的“下有对策”，只有当上级的一些经济社会决策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明显存在着差异时，才能采取一些符合本地实际的经济政策。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也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是要“执政为民”，是要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为地

方谋取长远利益；而不是“地方主义大于天”，将“对策”作为自己的政绩工程，作为实现自己向上爬、平步青云的台阶；更不是将“对策”作为自己中饱私囊、捞取好处的工具。如果“下有对策”导致“为民”理念的缺失，导致人情、金钱大于政策，个人关系高于组织原则，这就不正常了，也是不符合“执政为民”理念的。

第三，切忌成为“出头椽子”、“出头鸟”。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如果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严重的“折扣”现象，一些政策被“变通”执行，上面“风声大”，下面“雨点小”；一些政策被严重歪曲和修改，结果与决策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使得上级政策遭受“绑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这时，决策者就会想方设法，对各种“下有对策”的现象给予坚决地制止和纠正，各级纪律监督部门就会进行执法。这时，某个执行者钻政策空子厉害，玩“擦边球”过火，他的仕途也就到顶了，他也就会成为“下有对策”的罪魁祸首。

总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认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级政策，强调地方特殊性，采取敷衍性地执行、曲解性地执行、替换性执行、截留性执行，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就会导致出现“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奇怪现象，其结果必然是“祸国”，必然是“殃民”。但同时，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种“录音机”、“传声筒”式的干部，也不是党和人民群众喜欢的干部。



×××文集

省级机关某厅长 A，近段时间非常繁忙。他忙的不是公务，也不是应酬接待，更不是家务劳苦，而是忙于伏案写作、著书立说。他将十多年来，主要是担任处长以来的讲话、调研报告汇编成册，洋洋洒洒近60万字，上下三册，精装本，取名为《×××文集》。

取名文集、文选的，一般都是领袖或者名家，比如《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A，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将自己的文章取名文集，口气似乎大了一点。A 想了很久，觉得历史上的一些名家，开始时也不是什么名家、大家，所谓名家、大家，大多数是后人封的，但他们不也都出了什么文集、文选吗？死人可以出，活人为什么不可以出？同时，他觉得实在想不出比文集更好的名称。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出版文集也是一种政绩，而且是一种更不张扬、更为人称道，甚至可以垂名青史的政绩，当然需要有一个好的书名。

文集出版了，就要想方设法将它送出去。A 近日就忙碌此项工作。虽然是送，但也非常讲究。有的是“呈”，比如，中央的部委领导，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委组织部领导及兄弟厅局领导都是呈送的，不仅要签上自己的名，有的还要自己直接送到办公室去。这样不仅可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重，而且可以通过介绍文集中的一些典型篇章，加深对方对自己才华的认可。有的是“赐”，比如，本厅局的一些处长、干部，自己的一些亲信下属，以及一些亲朋好友，就是“赐”，当然签名也是不可少的，这会让对方更加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出版文集是个人出钱，纯属个人行为。这就错了。其实，领导干部出版文集，一般地，领导干部个人不仅不要出钱，而且还可以赚钱。因

为每个厅局每年都有大量的调研经费，一把手的文集当然就是重点调研课题，出版费可以在调研经费中开支。同时社会上一些企业家（主要是一些与该厅局主管的业务相关的企业家）、名流闻听后都会出钱赞助。比如像《XXX文集》出版后，厅局下属单位以及各市（地）、县局都出钱购买了一大部分，送给干部学习，这钱就作为稿费开支给A了。

A 获得了成功，名利双收。文集出版后，赞扬声不少，包括一些中央的部委领导、省里的领导、兄弟厅局领导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文集有观点、有实例，有思想、有文采。有的领导甚至认为，这是领导干部素质优异的表现，是领导干部能力水平日益提高的表现，是一件好事。A 听到大家表扬声，表面上还是非常的谦虚，但实际上也洋洋得意起来，自认为有水平、有能力、有文化，高出了同级干部的水平。

应该说，A 的能力、水平虽然得到了一些领导的肯定，但 A 并不满足，他认为“不仅要讲好话，关键要做好事”。A 所谓的好事，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够赏识自己，提拔自己为省级干部。但干部晋级，特别是晋升为省级干部，不是那么容易。过了多年，A 的梦想也没有得到实现。A 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感到不平衡，觉得组织亏待了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抱怨怀恨心理越来越甚，私心杂念越来越强，贪欲之心越来越大，最终，他不仅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反而将已有的东西都丢掉了，他被开除党籍、公职，进了监狱。

对于领导干部出版文集、文选，有人肯定，但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有相反的观点。

他们认为，领导干部出文集、文选，完全是领导干部个人利欲熏心的表现，这是另外一种不正确的政绩观。近年来，领导干部出个人文集、文选的越来越多。所谓的文集、文选，大多是领导干部的发言材料、调研报告的汇总，绝大部分不是领导干部自己的东西，而是秘书或者下属代笔的东西。所谓的调研报告，大多是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建议对策等四大部分，即新“八股”；所谓的讲话，大多是形势分析、重要性、指导思想、工作措施等四段论。大多文章要文采没有激情，要思想没有观点，毫无传承、保留的价值。领导干部之所以要出所谓的文集、文选，关键是想发行所谓的文集、文选，让领导、群众看到、了解

自己的所谓才华、政绩。这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不正确政绩观的表现。此风不可长，否则极易助长少数领导干部的欲望。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也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还像学习领袖文献一样，组织下面群众学习讨论，结果不久却锒铛入狱。现实给这些欺世盗名的“领导干部”作了最好的注释。

他们认为，如果领导干部真有水平，真的有文化底蕴，真的有理论功底，就自己动手，不要让秘书代笔。如果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有文化内涵，就去写几本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如果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有思想观点，就去申报几个研究课题，去写几本理论专著；如果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有深刻见解，就去写几本杂文、随笔。一个领导干部，如果真的能出几本这样的书，就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人家也会佩服。这样的书才可能传承，给文化宝库增添财富，千万不要去搞×××文集、文选，制造垃圾，浪费纸张，于国于民都无利。

他们还认为，领导干部出文集，这是玷污了文集、文选这一神圣称号。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出书立著，本来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特别是出文集、文选更是神圣，是“遗千载之功”。在中国的近代史中，能出文集、文选的人不是很多，像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这样的伟人，才有资格出文集。但现在，不要说一些厅局级干部，甚至一些县处级干部，也出版所谓的文集、文选，不仅贻笑大方，而且贻笑后人。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看到这些所谓的文集、文选，会作何感想？